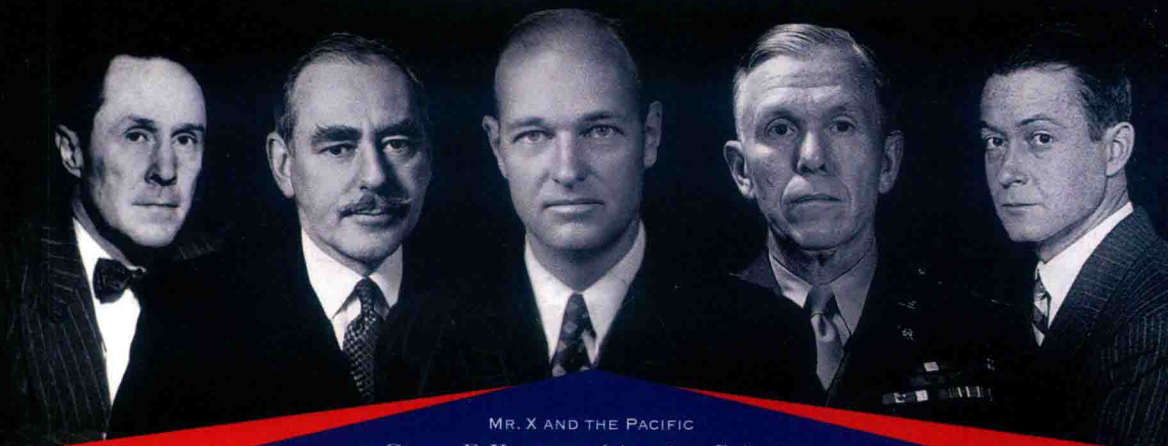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保罗·希尔最新作品



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

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

[美] 保罗·希尔 (Paul J. Heer) / 著 小毛线 / 译 夏小贵 / 校

乔治·C·马歇尔

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

迪安·D·艾奇逊

Dean R. Acheson

1891-1971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乔治·F·凯南

George F. Kennan

1894-1988

马赞涛

Ma Zan Tao (Mazhan Tao)

1904-1988

小约翰·帕奇·戴维斯

John P. Davies Jr.

1918-1988

考察凯南“遏制政策”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构想
探寻“冷战之父”的思想遗产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
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弗兰克·科斯蒂廖拉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
北京大学副教授于铁军

联袂推荐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

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

[美] 保罗·希尔 (Paul J. Heer) / 著 小毛线 / 译 夏小贵 / 校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北京·2020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授权，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 /（美）保罗·希尔著；小毛线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1

书名原文：Mr. X and the Pacific：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

ISBN 978-7-5155-1929-6

I. ①乔… II. ①保… ②小… III. ①乔治·凯南—传记 ②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东亚 IV. ① K837.127=6 ②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2776 号

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

著者	保罗·希尔（Paul J. Heer）
译者	小毛线
责任编辑	李涛
责任校对	丁洪涛
责任印制	李仕杰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
印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55-1929-6
定价	6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100102）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投稿邮箱	balimist0213@163.com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Mr. X and the Pacific :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
Copyright © 2018 by Paul J. Heer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GOLD WALL PRESS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序 为什么又是乔治·凯南？

张小明*

今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在30多年前翻译成中文的、乔治·凯南化名“X”发表在1947年7月《外交事务》季刊上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微信朋友圈被很多人转发。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更令我惊讶的是，没过几天，我接到来自金城出版社的电话，说是有本名为《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的译著即将出版，希望我能审阅译稿并写一篇序。要知道，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关注凯南，并且和他有过信件交流，也到过凯南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查阅其私人文件。我的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凯南有关，其中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已于1994年出版。此外，我在2008年也发表过一篇题为《乔治·凯南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的学术论文，拙文的题目与金城出版社即将推出的这本译著的书名竟然基本雷同！

我在阅读这本译著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因为提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主张而闻名于世的乔治·凯南在今天又开始被中国媒体和学界所关注呢？

我认为这与近年来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很大关联。众所周知，自从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政府公开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特别是美国单方面发动的对华贸易战令世人瞩目，有关中美进入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研究》副主编。著有《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新冷战”以及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言论日趋增多。今年4月，美国媒体披露的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有关中美关系属于真正的文明冲突、今天的中国比冷战时期的苏联对美国威胁更大之言论，更是语惊四座并引发热议。我们都知道，凯南正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第一任首脑（1947—1949），他领导下的该机构参与了冷战初期美国一系列重大对外政策的制定，包括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制定，他本人也正是由于时任该机构首脑的特殊身份而以“X”的署名在1947年7月《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系统阐述了“遏制”苏联的政策主张，因而享有“遏制之父”的称号。斯金纳的此番言论，自然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把她的作用和凯南的角色联系起来。

实际上，《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一书的作者身份以及出版时机，也有点儿耐人寻味。保罗·希尔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任职30多年后才进入学术界，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这本书是在他于20世纪90年代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修改和补充而成的，并于2018年正式出版。该书出版的时候，正值美国东亚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加上作者长期在美国政府任职的经历，这自然会让中国读者格外关注。该书作者在“致谢”中提到，本书的出版推迟了20年，是因为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职业生涯使得自己没有时间出版学术著作，后来他在把博士论文改写成一本书的过程中获得了美国情报界和政府其他部门上司与同事的慷慨支持与鼓励。或许某些读者会因此联想，特朗普政府的现任国务卿蓬佩奥不也是从中央情报局局长转任现职的？

但是，我们在阅读《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的时候，更需要关注的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并从中理解凯南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之间的关系。本书主要论述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时期（还包括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短暂代理政策规划室主任）参与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制定过程，同时也涉及他1953年正式从政府退休之前的某些相关经历。抛开作者曾经的身份和该书出版的时机，这的确是一部史料丰富、写作严谨、可读性强、极具学术价值的历史

著作。首先，该书使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包括解密美国政府档案文件以及当事人的私人文件（如凯南私人文件）。其次，该书是我所看到的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专门论述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之间关联性的学术专著。再次，作者有关凯南同时兼具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批评者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身份之论述，十分引人入胜并颇具独到之处。此外，这本书对于理解当今美国的东亚政策或许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这本书的主题是叙述凯南作为一个“苏联通”如何介入冷战初期美国东亚政策制定过程。按凯南自己的说法，他在东亚事务上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在1947年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东亚，也从未对东亚有过特别的兴趣。本书作者认为，凯南有关东亚的知识和认识，可能主要来自几位与自己共事过的美国外交官，尤其是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马慕瑞和曾经到访过延安的美国国务院著名“中国通”约翰·戴维斯，后者还是凯南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主要助手。但是，就是这么一位东亚事务的门外汉，反而深深地介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并发挥重要作用，这体现在美国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的政策制定上。从1947年开始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杜鲁门政府所执行的逐步从中国“脱身”、把日本视为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石、从朝鲜半岛撤军、把东南亚的群岛国家看作“遏制线”上的关键部分等政策，都同凯南及其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有着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改变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上，凯南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后来他被有的历史学家称为“扭转（对日）政策之父”。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已经辞去政策规划室主任并获准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休学术假的凯南，还短暂临时代理政策规划室主任和参与相关政策讨论，并且通过与时任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利克的秘密接触而促成了朝鲜战争停战谈判。

凯南在冷战初期之所以能够在美国东亚政策制定上发挥重要作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作为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的地位。二战后不久，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从合作走向对抗的演变，东西方冷战呼之欲出。正是在这个国际政治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之中，长期潜心研究苏联和俄罗斯历史、在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职多年但却很不得志的凯南，因为 1946 年 2 月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长电报”、系统阐述美国应对苏联威胁的政策主张（后来被表述为“遏制政策”），深受某些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的赏识，从而时来运转。1947 年 1 月，新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创建了国务院的一个新机构，即政策规划室，并且任命凯南为主任。凯南于是参与了冷战初期美国一系列对外重大政策的制定，包括马歇尔计划。可以说，凯南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几乎都是他作为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凯南总是从“遏制”苏联这个大战略目标来思考美国东亚政策，或者说他是从应对苏联威胁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国在东亚所面临的挑战。这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为“遏制”苏联这一特点高度吻合，从而使得一个“苏联通”可以很深入地介入东亚政策制定过程之中。

但是，凯南的角色还有另外一面，即美国东亚政策的批评者。早在 1949 年初艾奇逊取代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之后，凯南在很多问题上就已经同艾奇逊的看法经常相左，其政策建议往往不被上司采用，政策规划室也开始被边缘化。凯南因而提出辞去政策规划室主任一职，并告假离开国务院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他的申请获得上司的批准，于是保罗·尼采在 1950 年 1 月 1 日接任政策规划室主任，凯南改任国务院顾问并准备于当年 6 月底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由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艾奇逊请凯南推迟离开国务院的时间并且临时代理政策规划室主任（因为战争爆发的时候尼采在度假），直到这一年的 8 月底凯南才最终如愿去了自己的母校。也正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东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表现为增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干涉（包括军事干涉）力度，以及在该地区着力打造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包括美国与菲律宾、泰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的双边军事同盟）。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在东亚所执行的“遏制政策”开始具有明显的军事化倾向，这和凯南一直主张的政治遏制的思路是完全相反的。从 1950 年 8 月到普林斯顿大学休学术假至 1953 年 7 月正式从国务院退休，凯南虽然曾经几次被召回国务院参与政策讨论，并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52 年），但

是他主要充当美国对外政策（包括美国东亚政策）的批评者。比如，凯南认为美国可以承认新中国并降低与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水平，反对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批评美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并主张日本“中立化”，认为美国应该从韩国撤军，抨击美国介入和扩大越南战争，等等。从外交界退休以后的凯南，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和美国政策的批评者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度过的，只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曾经受命二度出山、担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1961—1963）。

不管是作为政策制定者还是政策批评者，凯南对东亚的认识都深受其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之影响，这也是《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一书着墨较多的内容。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凯南始终认为，在整个东亚地区，只有日本属于世界上几大工业一军事中心之一，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国在东亚执行“遏制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防止日本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中。而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则对美国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在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牺牲的。凯南及其领导的政策规划室所提出的有关美国重建和扶持日本、从内战中的中国“脱身”、从朝鲜半岛撤军、不介入东南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印度支那）事务等政策主张，都与这种观念有一定关联性。

其中，凯南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知最为典型。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可能由于深受马慕瑞 1935 年备忘录的影响，凯南对历史上美国介入中国事务背后的基本理念产生了怀疑，认为中国对美国并没有那么大的战略重要性，而且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仆从。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不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莫斯科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中国共产党获胜并不会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凯南自认为他的“遏制政策”不适用于中国，也和中国无关，中国在战略上甚至是可以牺牲的。因此，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室主张美国政府应当采取最低限度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脱身”政策，这一政策建议后来也成为杜鲁门政府的官方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去世之前，凯南都坚持自己有关中国对美国不具战略重要性的判断。对于尼克松总统 1972 年打开对华关系的大

门，凯南最初持批评态度，后来虽然承认它具有“建设性”，但是依然坚持美国应当与中国保持距离，不要对中国期望过高。即使到了1996年，他依然看不到中国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在2001年，凯南写下了可能是他关于中国的最后一个评论：“我未能理解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对那个国家的迷恋……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不会爱上我们。一旦利益出现冲突，我们首先要诉诸传统外交机构。这种问题在大国之间很正常。如果问题难以解决，也没有必要将中国视为危险的敌人。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接受友好谈判，也没有理由将中国视为主要盟友。在两种情况中，我认为我们都没有理由过分渲染两国关系。”

我在这里还想补充我所知道的有关凯南和中国的两件事，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凯南的中国观。第一件事是凯南实际上到过中国。1985年春天，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实习的时候，有一天在新华社《新闻稿》上看到一则简短的消息：1980年10月，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历史学教授乔治·凯南访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在北京会见了。但是，凯南自己好像对这次访华印象不深。在他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只有1980年10月15日在中国杭州所写下的不足200字的日记。第二件事是凯南与我的通信。1991年12月20日，当时我正在准备撰写有关凯南遏制思想的博士论文、之前给凯南写过信，凯南在回复我的一封信中说，他在1980年之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并且承认这是“我有关世界事务知识结构中的一个严重缺陷”，他认为那次对中国的访问增加了自己对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认识。

众所周知，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大概是凯南没有想到、也不能理解的事实。但是，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今天的中美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简单套用凯南当年提出的“遏制”概念来描述和理解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不合适的。此外，要理解凯南所说的“遏制”的真正含义，我们也有必要回过头去了解凯南自己的相关言论及其与美国官方政策之间的关系。

2019年7月11日

目 录

中文版序 为什么又是乔治·凯南? / i

序 章 一个被打断的战略视野 / 1

第一章 遭遇东亚

——继承一个战略视角 / 9

第二章 中国

——“最低限度援助”和“最大限度灵活性” / 29

第三章 日本

——“转向政策之父” / 55

第四章 退潮

——艾奇逊掌舵 / 97

第五章 朝鲜战争的前奏

——将“战略概念”应用于东亚边缘地区 / 123

第六章 朝鲜半岛

——“无知、错误和臆测的迷宫” / 165

第七章 朝鲜战争之后

——东亚战略视野的终结 / 199

第八章 越南

——“我再也说不了什么了” / 217

终 章 有关东亚的遗产 / 231

致 谢 / 254

参考文献 / 257

译 后 记 / 271

序章 一个被打断的战略视野

1950年8月21日，在朝鲜战争爆发并引起危机的两个月后，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时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¹的高级顾问（他推迟了公休假以帮助杜鲁门当局处理危机）——给艾奇逊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对美国东亚政策的总体方向提出警告。“我们当前的行动，”凯南写道，“在我看来，是如此希望渺茫、充满危险，以至于从诚实的角度出发，我劝你不要继续为此负责。”他认为，华盛顿在朝鲜半岛的目标和战略并不清晰，有可能会引发战事升级。同时，在日本保留美军力量的决定有削弱与东京长期关系的风险。此外，华盛顿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敌对政权之间的暧昧立场又有疏远双方及该地区其他国家之虞。最后，凯南注意到，法国在努力遏制越南争取独立的尝试，而美国对法国的支持几乎是必输无疑的。^①

凯南十分沮丧。因为在过去三年来，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简称PPS）主任，他建构了一套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思路，从而最小化美国在东亚的投入——乃至注意力。他一直借此试图避免陷入上面所提到的困境。作为美国国务院有关苏联问题的顶级专家和“遏制”（containment）苏联政策的提出者，凯南几乎把全部心思放在研究苏联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之上。凯南认

1 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1893—1971），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任美国国务卿（1949—1953）。——译注（不带圆圈的数字序号，下同）

① Kennan to Acheson, 21 August 1950,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624. Hereafter, volumes in this series will be cited as *FRUS* with year and volume number. ——原注（带圆圈的数字序号，下同）

为，苏联在远东的威胁并不明显，只需进行“周边防御”（perimeter defense）即可有效遏制。他的框架中心是一个复苏但却去军事化和中立的日本。他对艾奇逊的首要建议和他在政策规划室构想的立场遥相呼应：“我们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尽快停止对亚洲大陆的介入，并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凯南接着提出了一项非凡的建议：华盛顿应当提议撤出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力量，以换取苏联同意安排朝鲜军队撤出韩国。^①

他的建议被忽视了。凯南在写给艾奇逊的概述中也预料到了这一点：“我担心，这些建议将会像我的许多想法一样，与政府的主流想法差之甚远，对你而言没有什么实用性。”^②凯南在艾奇逊任下的国务院被边缘化了，他对此感到挫败 [这一情况促使了他决定公休，前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确实，他的许多观点变得“与政府的主流想法差之甚远”，无法在政策考量中脱颖而出。这在美国东亚政策上尤为显著。1947至1949年，凯南在中国和日本事务上扮演了具有深刻影响力的角色，在此之后，他发现美国的政策不断向介入和军事战略倾斜。他认为这是不明智的。自1950年夏天起，随着朝鲜战争加速了这一倾斜的趋势，他苦涩地见证了这一趋势是如何削弱并最终摧毁他不久前构想出的美国远东政策战略视野。

本书讲述了这一战略视野的兴衰，以及凯南有关东亚事务的遗产。尽管他的名字很少和东亚地区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参与和影响从未局限于他著名的对苏和对欧政策。确实，历史学家威尔逊·米斯康博（Wilson Miscamble）曾观察到，凯南对东亚政策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他对美国对欧政策的影响”——由于凯南普遍被认为在构想二战后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简称ERP，即马歇尔计划）^③中起主要作用，因此他在美国对欧政策上具

① Ibid., 625.

② Kennan to Acheson, 23 August 1950, Dean Acheson Papers, Box 66, “August 1950” folder,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

③ Wilson Miscamble, “George Kennan: A Life in the Foreign Service”,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81, no. 2 (February 2004): 29.

有重大影响。纵使他对东亚的影响乍一看稍纵即逝，但意义深远。

尽管本书着眼于凯南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时期（1947—1950），它也涵盖了凯南在政府之外的生涯——他在1953年从政府退休。本书探究了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凯南对东亚的观点在他漫长一生中（1904—2005）是如何演化的（有时候显然变化不大）。本书揭示了凯南之前对这一领域知之甚少，经验不足，但后来却令人惊异地广泛深入介入了这一领域。本书体现了他一整套独特、持续的思想。凯南相信他的思想为美国政策提供了合适的视野和方向，也能够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今日东亚所遇到的困境提供一些参考。

凯南广泛地参与了美国对远东的政策，那时恰逢他在冷战早期形成的遏制理念。在这一阶段，面对中国内战，他大力促成了华盛顿作出置身事外的决定——按他的“官方”传记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¹的说法，凯南的角色被认为是“中枢性的”。^①华盛顿在日本的战后占领政策从惩罚性手段转变为经济重建，他是这一转向的主要推动者。凯南随后尝试影响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政策，不过就没有那么成功了。但是，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被拒绝了，后来却被证实是正确的：在美国应对朝鲜战争爆发之时，他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几乎是唯一一位对军事干预三八线以北地区提出警告的人——他也是最早反对美国向印度支那地区投入资源、继承法国角色的美国官员之一。

凯南对东亚政策的影响几乎都是他作为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产物。乔治·马歇尔²将军——作为陆军参谋长的他被视为盟军赢得二战胜利的设计师——在1947年1月被任命为国务卿时创建了政策规划室。

1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 1941—），美国冷战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代表作有《乔治·凯南传》（*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获2012年普利策奖。

① John Lewis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298.

2 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1880—1959），美国政治家、军事家，曾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1939—1945）、国务卿（1947—1949）、国防部长（1950—1951）。

政策规划室与陆军部中的作战计划处（War Plans Division）扮演同样的角色，负责美国战略政策的方向。马歇尔挑选凯南作为规划室主任。与许多制定政策的人一样，马歇尔关心苏联正在产生的威胁。他也和华盛顿的许多人一样，对凯南在1946年2月写下的著名“长电报”¹印象深刻。凯南当时正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在电报中分析了苏联的战略视角及目标。^①马歇尔为政策规划室在制定政策方面赋予了中心角色，这是空前绝后的。加上马歇尔在华盛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战争英雄，他的个人地位强化了政策规划室的影响。只要马歇尔还当着国务卿，在机构间进行政策考量时，凯南和政策规划室写的政策报告就承载着马歇尔的分量——通常是决定性的——从而往往成为美国整体政策方向的基础。

凯南和美国其他制定政策的人，在看待美国在东亚所面临的战后威胁时，主要从苏联的威胁出发。战争期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同意在打败德国后对日宣战，以换取苏联获得中国东北地区港口和铁路的权利。尽管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有着联系，斯大林还是承诺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日本在1945年8月的投降打断了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但是苏军在此之前已经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按照美苏临时的共同约定取代日本在这些地方的殖民占领。二战后，苏军的军事存在为冷战在东亚搭建了舞台。

在中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苏联的存在感到不适。前者是因为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为斯大林转向为共产党提供物资支持创造了机会——斯大林不久后确实这么做了。后者对斯大林感

1 长电报（Long Telegram），时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6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遏制政策”。

①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of Kennan's appointment by Marshall is contained in the enclosure to a 9 February 1953 letter from Kennan to Marshall, in "Documents Loaned to Dr. Forrest Pogue by George Kennan", February 1959, Verifax #358, George C. Marshall Research Foundation, Lexington, VA. See also Kennan's *Memoirs 1925-195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7), 294-95, 313, 325-27; and the account in Gaddis, *George F. Kennan*, 228-30, 252-53.

到不满，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领土算计，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在国共对立之间采取名义上的中立态度。美国渐渐转向国民党——国民党是所谓民主中国的代表，美国与其有着长期的政治和情感纽带——而与共产党保持实用性的对话。最重要的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在 1945 年 12 月派马歇尔赴华，尝试调停日本战败之后很快重燃战火的中国内战。一年后，当马歇尔在 1947 年 1 月返回美国（担任国务卿）时，基本上没能完成这一使命。中国内战继续升级，局势逐渐朝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日本，政府的投降和美国的完全胜利开启了美国主导的军事占领。军事占领的主持者是驻日盟军总司令（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简称 SCAP）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名义上，军事占领由包括苏联在内的各盟国所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简称 FEC）进行监督，它表面上按照日本投降条款负责对占领政策提出建议。然而，华盛顿的主导地位和手段让它得以让苏联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从一开始，占领当局就着眼于惩罚日本战犯、解除日本武装、摧毁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工业能力。

朝鲜半岛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各由在此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占领：北方是苏联，三八线以南是美国。盟国计划在联合国托管朝鲜半岛——通往朝鲜半岛独立的过渡阶段——后撤出各自的占领武装。然而，华盛顿和莫斯科未能在托管上达成一致，而朝鲜半岛的人民则希望立刻获得独立。1946 至 1947 年，这一僵局使得半岛两个区域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占领该地区的两大势力之间也是如此。

在东南亚，日本战败产生了真空。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此崛起，尝试阻止欧洲殖民统治卷土重来。问题最为严重的是法国和荷兰分别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地区重建战前统治的努力。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曾经支持东南亚民族自决的理念；但是在他去世和战争结束后，出于和欧洲盟友——尤其是法国——在其他地方合作的需要，加上害怕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可能会被苏联所利用，华盛顿在推行这一理念时显得束手束脚。美国试图在菲律宾建立一个榜样——它在美西战争后的 1898 年获得